

山東黨史資料

一九八二年 第三期



○ 濟南

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編

山东党史资料

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总第五期)

1982年7月·济南

目 录

谈党史研究的成就、问题和态度	肖 克 (1)
----------------------	---------

一九三二——三三年五县农民暴动

回忆博兴暴动	马千里 (17)
--------------	----------

博兴暴动点滴	李 震 (28)
--------------	----------

关于博兴游击战失败的原因 (档案资料)	(31)
---------------------------	------

益都暴动纪略

.....中共益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	(33)
--------------------------	------

益都暴动追忆	彭瑞林 (46)
--------------	----------

山东青州游击战争失败的始末 (档案资料)	(56)
----------------------------	------

日照暴动前后

.....中共日照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59)
---------------------------	------

日照党的早期活动和日照暴动	陈 雷 (75)
---------------------	----------

一、郑绳武关于日照游击战争给中央的报告

(档案资料)	(85)
--------------	------

二、陈雷等关于鲁南游击战争给中央的报告

(档案资料)	(87)
--------------	------

一九三三年沂水暴动始末

.....中共沂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	(93)
--------------------------	------

关于沂水党组织领导的农民暴动	王 涛 (112)
关于争取乌旗会的回忆	刘 钊 (118)
沂水西北乡农民革命活动的经过	刘史明 (121)
苍山暴动的前前后后	
.....中共苍山、临沂、郯城县委党史办	(126)

回 忆 录

一九二六——二九年沂水县党组织

发展概况	朱寿年 (138)
沂水县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情况的回忆	邵德孚 (145)
沂水县党组织早期的一些情况	纪 纲 (156)
一九三三年前后我在沂水县委	
活动情况回忆	王光华 (163)
抗战前沂水西北乡党的活动情况	李道德 (171)
谢梅村回忆沂水县党的活动 (参考资料)	(181)

济南建党后初期活动片断

.....马克先口述 董天佳整理	(189)
再忆红色的济南乡师	姚仲明 (201)
革命岁月(续一)	武中奇 (211)

编 后	(237)
更正表	(238)

谈党史研究的成就、问题和态度*

肖 克

几年来党史研究中的成就与问题

先谈谈党史研究的成就。

打倒“四人帮”后，党史研究中拨乱反正，工作空前活跃，中央许多单位、院校以及各省市和有些地县，都在做党史资料的汇集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成就。尤其在三中全会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指导下，许多禁区开始打破了，开始探讨我党历史上一些应该讨论而过去又不能讨论的问题。首先，最大的成就，就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讨论，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三十二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其次，对民主革命时期的许多问题也在重新研究。比如：对陈独秀，不只批评他的错误，也研究他在五四运动及建党时期的作用了；对于我党的建立，过去只讲毛泽东同志，现在对其他主要领导人的作用也渐

*本文系肖克同志在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的第二、三部分。本刊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渐明确了；对于“一大”开会的日期考证清楚了；对于中国革命由农村到城市的道路确定，由过去那种只提一个人，而如实地改为集体创造了；对江西苏区打A.B团及富田事变问题，也开始探讨了；对第四次反“围剿”的态度，由过去的否定、回避到重新研究，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了；对百团大战，也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了；对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主要负责人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也在探讨，等等。这样，通过大家的探讨，把许多问题弄清了是非，没有弄清的继续研究。探索真理的气氛，一天天浓厚起来。这是史学界的新气象，关系党史研究的正本清源，以及今后党的事业的发展的问题。

但是，也感到党史研究方面还有些问题，要和同志们商量。

甲、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使用，不够认真、严肃。

第一，对流散在民间、个人甚至国外的材料，收集的不够。收集到了，整理研究也不及时。近来史学界提出“抢救”，好得很。当前着重于一、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着重于找老革命，从他们身上挖宝，是好办法。第二，有了资料而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档案室、保密室，材料很多，还有敌伪遗留下来许多材料。搞档案的同志，做了许多收集、整理和保存工作，但过去过于强调保密，利用不够，甚至互相封锁，这样就不能主动利用已有的

材料作研究。我们老同志在这方面也有责任，我过去知道一些材料的线索，但很少提出。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江西，有人访问我第一次反“围剿”情况，我才提起战前有个《八大胜利条件》的政治动员文件，后来从民间找出来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前，中央来了指示（即九月来信），我一直到前年春天才提出从中央档案馆找这个材料。老同志经历多，要注意提出材料的线索。最近看到了政治学院编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我一方面很高兴，但也感到出版太迟。因为这个材料，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前也可以出来。当然，不能象现在这样完整。第三，有的同志预先定了观点，然后按图索骥去搜集材料，对自己有利的就重视，关系不大的，也牵强拉上，曲意修补。这种材料，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歪曲的。有的掌握了材料，但研究中只用与自己有利的，否则即便是事实也不使用。

乙、（略）

丙、唯上、唯权威、唯定论。

唯上、唯权威、唯定论，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现在也还有。他们认为上级、权威作过的决议、决定或者讲过，以及过去习惯上或舆论形成的定论，即便过时了，不适用了，也不应提出不同意见，更不能改正。甚至有的定论，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也不怀疑，也不研究。他们的思想，被那些老框框束缚得死的。如江西一九三〇年冬及三一年春的肃反及后来对

富田事变的处理，我看是错了，但直到现在对有关人员也没有平反。又如对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有些思想不同的认识和工作方式方法上的争论，直到今天还有人说是路线上的争论。如果是路线的话，请问：双方纲领性意见是什么（指够得上真能称为路线标准的纲领，而不是拔高的、不合事实的）？列不列入全党的路线斗争范围？又如对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红军中的工作，长期说他是什么机会主义，这也是当时党的决定及后来有关负责人的定论。至于经不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不思考的（据说邓是反对米夫及王明路线的）。这些倾向，现在还有不同程度的存在。这都是唯上、唯权威、唯定论影响的结果。定论（定论可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及本来正确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不能再用的，这里指后二者）一经形成，在人们心目中，容易习以为常，形成习惯势力，无形中令人带上盲目性，束缚人们的思想。因此，对于定论，不管来自那个方面，都要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理，凡不符合历史事实及现实生活的就要重新检查。

还有些人，写作前不做充分的调查研究，或引用权威不准确的论断，后来发现错了，为照顾自己和“权威”的威信，也不改正，任其以讹传讹，例如，过去说洪湖苏区执行立三路线是在邓中夏到来之后，其实，立三路线决议是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一日作出的，很快传达到各苏区和红军。洪湖苏区及红军在六月间就知道立三路线

了。七月四日红二军与红六军在公安会师，按照中央的决定组成红二军团。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但后来甚至在去年有的回忆录还说洪湖苏区是在邓中夏到后才执行立三路线。实际上邓是九月十日才到洪湖的白螺矶，于二十日赶到周家嘴召开前委会议才传达中央指示，要二军团渡江与一方面军配合行动。如果把时间核对一下，就可以知道不是邓中夏到洪湖之后才执行立三路线的（当然，他受中央委派到洪湖，只能在当时的中央路线下工作），这些问题，只要注意和忠实于历史事实，就可以认识，用不着复杂的推理、判断。

总之，历史事实就是事实，绝对不能改变。任何权威也无此权，任何定论也不能定。这是唯物主义者的起码态度。当然，在事实面前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这是不可免的，也是正常的。只有民主讨论，才能搞清楚。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讲过，要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我看这也适于党史研究。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说：“对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民主讨论的办法求得解决，决不能采取压服的办法。”根据这个思想，绝不让禁区、半禁区或错误的权威、定论（包括本来正确而过时的）来限制党史的研究。能写文章就写，有些问题不能公开写或暂时不能写，可以内部研究，可以相互交换看法。过去那种不让讲不让写，讲了要查动机，写了要以底稿作根据来斗争

的反民主的办法是不对的。但是，有些对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就要根据不同情节，加以教育、批评，必要时给以适当的斗争和限制。把人民内部的民主讨论与对于敌对性的思想言论作适当的批评限制，是统一的。这二者的掌握，很不容易，只能从它的主流来看。不要稍有逾越（指认识不清的、不经意的）即上纲上线。

×

×

×

前面说的这些，三中全会前大量存在。现在虽然少了，仍不容忽视。还要指出，我说不要唯心、唯权威、唯定论，不是说可以不服从上级，不要权威，可以无组织无纪律及对党的决议、领导人妄加非议。而是说，上级说的，权威说的，已有定论的，只要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东西，就可以研究，也应该研究，经过研究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按正常组织程序加以改正（指需要经过组织程序才能处理的问题，不是指一般的学术问题），这样才算得上对党对人民负责，才算得上有党性。党性是党史研究工作者应有的品德，也就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的“史德”。

丁、褒贬失当，随意上纲。

过去滥用或轻易用路线斗争，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地区和部门，寻找两条路线斗争及其代表人物，把一些不属于路线问题的不同意见上纲上线，弄得处处有路线，天天有斗争，搞乱了党内生活。几年前，来找我谈历史的同志，常常问那时期哪方面有什么两条路线斗

争，令人很难回答。诚然，中国革命斗争，非常复杂，有国内敌人与国外敌人，城市与乡村，根据地与敌占区、游击区，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等等。境况各异，革命人物在不同的革命舞台上的活动有所不同，对他们的评论不能采用一种模式。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除极少数外，都属于党内性质。有些文章和文艺作品，对革命队伍中犯过错误的人，不看他整个革命经历，用近乎“四人帮”那样的面目出现，是不好的。退一步说，即便有些人后来消极甚至叛变，对于他们变节之前的表现，也不能这样对待。

在革命队伍中，领导人的马列水平有高低，能力有强弱，工作经验有多有少，党内外的政治影响也不一样。对他们的评论和宣传，只能根据他们在革命活动中的具体情况（也要加上有关的其他因素）放在当时的历史地位。如果写的是具体人，就不要和艺术上塑造典型性格一样，以反面人物去反衬正面人物。当然，确有鲜明的路线斗争时也可以，如大革命末期的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与陈独秀、彭述之的斗争；十年内战末期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与张国焘的斗争等。但这是少见的情况，即便在中央也不多。这是研究历史的同志应该注意的问题。写回忆录和写以历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都要深入去研究历史事实。

对党史研究的态度

千言万语，可以用一句话来点明，就是实事求是，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人类的历史观念，在原始社会至少在其末期就产生了。到了文明社会，即到了奴隶社会之后，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就懂得借助于历史经验来统治那时候的社会国家了。司马迁的《史记》，不少篇末有：“太史公曰”一段评说，根据他的立场从历史事实中发一篇议论。司马光写史，用“资治”二字，也不少地方在“臣光曰”之后发一篇议论，都是这个意思。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有自觉地改造社会的目的与愿望，研究历史，是为现在及今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认识过去的革命历程，可以展示未来的革命前程。重视历史的研究，也就是为着现在和今后的社会。

我认为历史工作者，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前提下，要有秉笔直书的精神。充分占有材料，是第一步也是很艰苦的工作。历史材料很多，有些年代很久，也不一定完整。情节复杂，真假难辨，有些还因政治斗争的利害关系，有篡改、销毁和隐藏的，保留的也不一定都准确，收集整理很不容易。但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在文明社会要消灭篡改也不容易。文字的、实物的、口头的都可以流传下来。当时的统治者或什么，无论用什么办法，也不能把历史搞掉。举个例子，明朝的方孝儒，在燕王

（后来的永乐皇帝）打到南京的时候，要他写登基书。方孝儒先不肯，强迫他写，他写了“燕贼篡位”四个字。明成祖气急败坏地说：“汝独不顾九族乎？”（灭九族是封建社会最大的刑罚）方孝儒回答：“便十族奈我何！”永乐皇帝真狠，灭了他十族。杀了八百七十三人。而且规定，普天下的人都不准说方孝儒的名字，也不准读方孝儒的文章。但历史很会嘲弄人，过了三十年，就有人说方孝儒的名字了。过了五十年，就有人把方孝儒的文章拿出来读了。过了一百年，就发现方孝儒的后代，在南昌当了名叫“司训”的小官。因为，南京围城的时候，方孝儒把他的幼子，托上海一个姓俞的朋友抚养。冒充俞姓，一直过了一百年，才说出这件事来。方孝儒有位同乡叶秀才，把他的后代接回天台去，复了姓。你看那明成祖真是做绝了，但还是消灭不了。至于对方孝儒如何评价，是另外的问题。特别由于我国历史悠久，往古的事迹，还可以从大量的地下发掘得到东西。秦始皇烧书，过了好多年，还从孔夫子家的夹墙里面，翻出不少书来，这都是愚蠢的统治阶级想不到的。

我们研究六十年的党史，即便是建党初期，当事人有的还在，大量档案还保存着，反面材料也不少，这些材料分散到各方面，只要认真收集，总可以得到。有材料就好办了。周恩来同志在五十年代末动员编写文史资料时说，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他要求我们注意“存真”、“求实”。在一九四四年《关于党的“六大”的

研究》中就说过：“先说事实，事实是对的，就说对，不对的，就说不对，结论放在后面。”我认为事实是靠材料来说明的，材料准确，就有存真的基础了。用准确的材料作正确的分析，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也就求实了。

关于秉笔直书，是指事实拿准了，就要有如实反映事物本来面目的勇气。写历史本来就难，写现代的人和事更难。第一，现代的人和事不象过去的人，已经盖棺论定。即便盖棺，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论定，因为有的人的历史本来就很曲折。康生盖棺的时候，美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现在怎么样啊！第二，现代人现代事及主要人物，有些人即便去世，也很有权威，别人怕触动他，还怕舆论不利，甚至怕打击报复。第三，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政治原因，即便是事实，不应写或不能立即写的也有。在过去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不打倒林彪、“四人帮”，即便是大跃进那样的荒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内乱，以及多年来连续不断搞政治运动产生的大量冤假错案，是不能重新写历史的，然而这只是历史的曲折，不是历史的必然性。

秉笔直书是不是凡属于事实都写？我觉得不能搞客观主义，有闻必录。有些不重要的事实，与政治经济及重要问题无关的事实，生活问题，就不必写了。不久以前，我看到一位朋友写陈独秀的回忆，说他有“寡人之疾”，这就没有意思了。这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采取“宜粗不宜细”的方针，是适当的，因为由中央委员会来

作历史性的决议，写到这个程度就行了。

中国三、四千年来，文化悠久，很重视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论，有不少杰出的史官和治史论史的人，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这样传统，我认为可取其意而加以运用。也就是说，第一，不为权势所屈而隐其恶；第二，不为权势所诱而为之吹捧；第三，不肯定一切，锦上添花，不否定一切，落井下石。

要做到这几点，只能实事求是，忠于事实。清朝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德”，他解释说是指“著书者之心术”，认为“险恶矫诬的人，不足以言史。”他把“著书者之心术”称为“史德”，近似我们说的观点立场，虽然代表的阶级不同，也不妨沿用。中国历史上有些史官，我看就是有史德的人。他们忠于自己的职守，真做到不为权势所屈而隐其恶。例如齐国的大夫崔杼，杀了齐庄公，齐国的太史立即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把他杀了。太史的两个弟弟接着又写，又把他们杀了，还有个弟弟又照样写，崔杼没有办法，只好不杀了。当时有个南史氏，知道太史被杀，他也去写，听说写成了，才回去的。还有晋国史官董狐，敢写权臣“赵盾弑其君”，等等。我说这些，感到这些人真有勇气。还有些人不是史官，也有这种气概，象海瑞向嘉靖皇帝上奏章之前，把棺材买好了才送去，他知道很可能死，但并不怕。类似这样的还有。关于海瑞，我听到毛泽东同志多次称赞过，有时还把汉朝的汲黯，宋朝的包拯一起讲。对海瑞讲得详细，

无非是要我们吸收些民族美德罢了。我现在仍然认为他讲得对。历史上评海瑞的还多，例如清末的薛福成，是个改良主义者，外交官，他写了一篇海瑞论，作了好的评论。他说海瑞到江南当巡抚，强制曾任明朝首辅的徐阶退田。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剧本，主要是描写这个历史的。但“文化大革命”前夕，以批《海瑞罢官》为前奏，把海瑞打入冷宫。

海瑞是应该恢复原来的评价的，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中有少数人继承封建社会兴旺时期及朝代更替初创时期，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的一些典章制度，于人民有益，至少无害。这些人较公正、廉洁、习惯上称为清官，他们人数不多，如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要团结的开明士绅一样。他们是地主富农中的开明人物，我认为这部分人在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的结构中是存在的。开明士绅那时候约有几万人，包括家属大概有二、三百万人。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由于他们过去在社会活动中有一定作用，作为社会意识，多少还有些影响。恢复对海瑞的评价，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说明我们共产党人是善于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对现在团结更多的人，可能有好处。在林彪、“四人帮”那些奸臣弄权时期，写真实历史是不容易的，即便如此，也有些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敢于坚持真理，象张志新同志，就是一位永远值得景仰的人物。她在被送进所谓“学习班”和批斗大会上，一次又一次阐明自己的观

点，说林彪鼓吹的“顶峰论”是错误的，“五一八”讲话是为大换班大清洗制造舆论，“对林彪没有什么信赖”。她认为江青不是什么“文艺旗手”，而是破坏祖国文艺的祸首。她认为彭德怀同志上书言事，是党纪允许的，不应定为“反党问题”，应该平反。“四人帮”把张志新投入监狱，受到多次蛮横无理的审讯，使她肉体与精神受到长期而残酷的折磨。他们先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她无期徒刑，问她有何感想，她说：“我的立场观点未变！”

张志新仍然没有被林彪、“四人帮”所征服。最后，判处她死刑。问她有什么话说，她仍然说：“我的观点不变！”

张志新最后的声音，使一个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的英雄形象鲜明地显示在我们面前，正如刘知几说的“毋污青史”。她不是历史家，却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放出了奇异的光彩，也成为写历史的人学习的好榜样。

当然，我不是说在斗争中可以不注意策略，今后的社会发展，即便大家吸取了《决议》的教训，也还可能出现复杂情况。但不管怎样，要讲真话。即便一时不能讲，也不能把假说成真，真说成假。

历史是人类在社会活动(主要是生产活动)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有什么样的社会活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研究历史，只是写出其本来面目而已。“文化大革命”这场严重的灾难，过去说是非常必要的，及时的，正确的，现在恢复其本来面目